

长 沙 文 史

宗 教 史 料 专 辑

长沙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长 沙 市 宗 教 事 务 局 主编
二〇〇一年八月

顾 问：韩轶凡

主 编：郑兆欣 周剑球

编 委：梁小进 肖寒露

何秀衡 王丽西

责任编辑：梁小进 何秀衡

目 录

综 述	周剑球 刘孚权(1)
长沙佛教史述略	戒 圆(14)
我在长沙自在庵挂长单	刘绍宗(20)
我的佛门生涯	释大镜口述 李宏 张超整理(28)
寺庙生活的回忆	胡一宗口述 丁冰玉整理(36)
我的桐溪寺的日子	戒 圆(42)
长沙市僧尼组织手工业生产始末	黄 虬(46)
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行述	冯毓孳(51)
清代长沙铁炉寺僧尼小传	自 然(55)
明真法师传略	离 执(58)
淡泊宁静 风范长存——忆戒圆法师	苦 心(66)
忆戒圆	蔡日新(69)
愿战争永息 灾难遍消——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	
	何秀衡(73)
一诚法师	宏 超(83)
古麓山寺小史	僧 史(86)
今日麓山寺	晓 荷(90)
浏山密印寺的变迁	周德明(94)
唐代古刹石霜寺及其十八景	何隆莱(99)
千古名刹开福寺	能 净(106)
开福寺史略	僧 乘(108)
铁炉寺的历史与现状	自 然(112)
望城境内的五大佛寺	法 乘(121)

黑麋峰古刹揽胜·····	罗养一(126)
六合寺琐记·····	佚名(130)
清泉寺的兴衰·····	杨国兴(132)

长沙道教述略·····	刘国强 马勇奇(137)
长沙岑山上圣传·····	罗俊扬(153)
罗浩明道长传略·····	周至仁(156)
长沙的三处道教宫观·····	马勇奇(162)
道教胜地云麓宫·····	周勇慎(165)
千古名山陶公庙·····	柳克文(168)
今昔河图观·····	方振华(177)

伊斯兰教与长沙·····	郑晋溪(179)
三十年代维护回民公墓之争始末·····	张名世(185)
麦加归来话朝觐·····	黄承吉(191)
我的父亲马少成阿訇·····	马兆瑞 马建平(196)
父亲黄承吉的一生·····	阿米勒·黄福玉(200)
解放前的长沙清真寺·····	张名世(205)
长沙清真寺的变迁·····	马翔林(209)

长沙天主教概况·····	郭先开(212)
天主教在浏阳的传播·····	欧德斋 屈天锡(231)
长沙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忆述·····	余运昌(236)
回忆屈天锡主教·····	张 炬(241)
长沙天主堂·····	郭先开(248)
靖港天主教堂·····	余光灿(251)

基督教与长沙·····	罗保罗(253)
-------------	----------

基督教传入长沙始末·····	梁湘山(258)
杨熙少及长沙基督教会早基期的情况·····	杨大慰(263)
我的从教生活纪略·····	李雍吾(273)
我所知道的基督教长沙圣公会·····	李遇恩(278)
我所知道的湖南圣经学院·····	梁湘山(285)
欧美各国教会在湘开办学学校概况·····	劳启祥(290)
关于“三一”小学的点滴回忆·····	李遇恩(301)
基督教在浏阳办学梗概·····	何 鲁(306)
浏阳红十字会医院的创立·····	人 可(308)
解放前的宁乡基督教·····	陶述生(310)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与活动·····	冯崇毅(317)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和张以藩·····	朱铁蓉(328)
长沙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回忆·····	梁湘山(340)
长沙市基督教老年人之家的创办与发展·····	何秀衡(343)
鲁赐生传略·····	汤清平(345)
长沙基督教永恒堂及其他几所教堂·····	姚增谊(351)
基督教城南堂的建立·····	柳汉斌(355)
八十年代落实宗教政策的回忆·····	刘孚权(357)
长沙宗教大事记·····	刘孚权 何秀衡(378)

综 述

周剑球 刘孚权*

长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自古以来，就是湖南全省宗教传播和发展的中心与重点地区之一。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也对长沙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佛教是传入长沙最早的宗教。三国吴末帝宝鼎三年，即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僧人竺法崇在长沙岳麓山创建麓山寺，是为长沙有宗教活动场所之始，也是佛教进入湖南之始，至今已有 1730 多年历史了。麓山寺也成为现今全国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寺门楹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是其真实的写照。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据历史记载，东晋太尉长沙郡公陶侃之孙陶淡、曾孙陶烜在长沙城东 30 里之临湘山学道修炼，是为道教传入之始。南朝梁天监四年（505 年），长沙士民建庙祀之，称陶真人庙，又称陶公庙，是长沙有道教活动场所之始。另据史籍记载和传说，东晋时，有道士许逊来浏阳石柱峰掘穴结

* 周剑球，系长沙市宗教事务局局长；刘孚权，系原长沙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副处长。

庐，诵经立说。南朝梁天监初，高道邓郁之在长沙岳麓山修道炼丹。

伊斯兰教是随着回族和维吾尔族人民迁居长沙而传入的。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回民马成中授长沙卫校尉，落籍长沙，伊斯兰教随之传入长沙。15世纪，长沙穆斯林在城西金线街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

天主教传入长沙是在清朝初期。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1699年）之间，葡萄牙耶稣会教士陆若瑟第一个来长沙从事传教活动，并于1699年在长沙修建了一座教堂。然而天主教并未能随即在长沙传播开来。由于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导致清朝廷实行禁教政策，驱逐外籍教士，强令中国教徒退教。长沙天主教因此停止活动，教徒星散。天主教在长沙的传播从此陷入停滞状态，长达一百余年。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传教士倚仗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于是，天主教重新进入中国，基督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长沙的传播却是十分艰难和缓慢的。湖南偏处内地，广大官绅士民对于凭借外国侵略而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对于一些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十分愤恨，因而采取了强烈抵制的态度，而省城长沙尤为突出。1861年6月，长沙数千士民聚会明伦堂，反对外国传教士来长传教，并刊刻了著名的《湖南闾省公檄》。又有宁乡举人崔暕，编撰《辟邪纪实》一书印行，进行反洋教宣传。至90年代初，更发生了大规模的周汉反洋教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产生了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因此，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称长沙为“铁门之城”。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有外籍基督教传教士郭修礼、杨格非、雅学诗等进入湖南，企图来长沙传教，但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被阻于长沙城外。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长沙反

洋教斗争暂告停息，西方传教士又加紧了对长沙的浸透。基督教势力的行动尤为迅速。是年，曾五入湖南、三至长沙的英国伦敦会牧师杨格非，得到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帮助，经湖广总督张之洞行文湖南巡抚通令保护，正式进入长沙。1902年，杨格非即在长沙北门外购地建房，设伦敦会教堂。基督教进入长沙。其时，天主教势力也乘着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淫威，进一步向中国内地侵逼。1902年，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翁德明在强迫清政府处理1900年衡州教案的同时，乘机进入长沙，并在长沙北门外（今长春巷）购地建造了天主教堂。天主教重新传入了长沙。

二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长沙，其途径、方式各有不同；经过千百年的流传，由于种种原因，各有其兴衰隆替的历史，也有着共同的遭遇。

佛教自魏晋时传入长沙，到南朝时就得到一定发展。其时长沙属湘州，湘州刺史王僧虔、夏侯详、王琳和长沙内史肖沅等先后兴工修葺麓山寺。著名僧人慧生、道盛、昙迁、慧球曾在长沙开筵弘法。

隋唐五代是长沙佛教的鼎盛时期。当时，由于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社会经济文化的兴盛繁荣，以及禅宗南宗在江西、湖南的发展，长沙佛教迅速发展。一是创建了一批佛寺，其著名的有密印寺、道吾寺、石霜寺、上林寺、宝林寺、华林寺、桐溪寺、云盖寺、开福寺等，有的规模宏大，僧众千人。二是宗派较多，高僧辈出，如禅宗青原系宗智、庆诸，禅宗南岳系灵祐、慧寂、景岑，禅宗云门宗用清等。灵祐、慧寂开创南禅沩仰宗，使密印寺成为沩仰宗的祖庭。此外，天台宗集大成者智者大师，

曾出家于湘州果愿寺，弘法于麓山寺。

宋代的长沙佛教仍然较为发达，南禅临济宗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创了新的支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高僧楚圆以石霜寺为道场，另开支派，其两大法嗣方会、慧南分别创杨歧、黄龙派，后传至日本。高僧道宁中兴开福古寺，其禅法亦传至日本。元、明、清三代，长沙地区的佛教逐渐衰落，寺院屡遭战火破毁，虽屡有重建，但终未能恢复隋唐时的规模；高僧上人虽代有传承，亦不及唐宋之盛。

长沙道教于魏晋南朝即有初步发展。至唐代，由于统治者在重视佛教的同时大力推行道教，长沙道教获得长足的发展。各色宫观大量兴建，如长沙上清宫、长沙县麋峰古观、浏阳升冲观，宁乡双峰观、仙女庙等。同时，有不少著名道士活动于长沙，如天台派传人肖灵护、妙应真人孙思邈、太乙真人等。宋、元至明初，长沙道教仍有较大发展。道教宫观除原有之外，又新建不少，主要有宋代的斗姥阁、寿星观，元代玄妙观、嵇州观，明代真武宫、云麓宫（明成化年间在原有黄冠羽士修炼场所的基础上扩建）等，从而形成了长沙道教场所的整体格局的整体格局。自唐以来，全国著名道教场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在这一时期形成。其中长沙即有第二十四洞天洞阳山洞、第二十二福地鹅羊山福地、第二十三福地岳麓山洞真墟福地（云麓宫）。名道亦不乏其人，宋代王乐仙，为宋代金丹派之传人；元代张道贵融合全真、清微二派，世称“武当清微派”；明代喻道纯被诰封普济真人，并领京师道教事。明中期以后，长沙道教逐渐从停滞走向衰落，趋于民间和世俗化。

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维吾尔族人而传入长沙，明初以后，又有北京、南京、陕西、云南、广西及本省邵阳、常德、益阳等地的回、维族人迁入。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入湘作战，亦有不少西北将士定居长沙。长沙伊斯兰教信徒日益增多。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他们在城西三王街兴建清真寺一座。其后又有不少回维族穆斯林迁来长沙，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在城西三兴街建造一清真寺。清真寺的一再建造，反映了长沙伊斯兰教的发展。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日趋激烈，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和尖锐，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在这一形势下，长沙宗教的发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各宗教也都力图适应社会的潮流，进行一些自身改革，以求不断发展。

近代时期，长沙的佛、道二教继续走向衰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太平军由桂入湘，攻打长沙，使佛寺道院受到严重损失。戊戌变法后至民国初，新式学堂兴起，由于政府的提倡，出现“庙产兴学”运动，佛道教寺观又被严重削弱。加以新学界人士提倡破除迷信，“公庙半改为学舍，私庙则多夷作民居”，教徒“人数亦大为减少”。五四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精神大发扬，宗教思想亦受到压抑。大革命时期，“打菩萨，毁寺庙”，抗战时期，“四战一火”，更是使佛、道二教受到惨重损失。持续的动荡与战争，宗教亦不可能顺利发展。^①

然而，一些有志之僧人道士，仍在保定信仰，坚持宗教活动。一些宗教场所被彻底破毁，但不少著名的寺庙宫观如麓山寺、开福寺、密印寺、云麓宫、陶公庙等得到修复，道教并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和1929年新建了长沙县河图观和浏阳青山道院。著名的高僧名道也屡有出现，如佛教寄禅、笠云等，道教易本立、罗永耀、马三保、龙教镇等。

在这一时期，长沙佛、道二教为适应时代发展进行改革，力求振兴。一是创办宗教团体。1912年，佛教居士吴嘉瑞等在长

^① 见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十章。

沙创立湖南佛教会，与僧尼共议佛学。1926年，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等在长沙召开佛教代表会议，成立湖南佛化会，倡导“全民佛化”。在此前后，长沙佛教界还相继成立了长沙佛教正信会、长沙县佛教会、湖南佛教居士林、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市支会等团体。^①二是兴办了一些佛教文化教育出版和社会慈善事业。清光绪二年（1876年），我国著名佛学家杨文会应邀来长沙指导，设立了长沙刻经处。此后长沙佛教界还先后成立了长沙佛教讲习所、湖南佛教慈儿院、沔山佛学社及一些私立小学。道教的组织素来分散，但也产生了自己的团体。1913年，刘理霖、侯理年等发起，在长沙成立中国道教会湘支部。1923年和1924年，又分别成立了道会长沙分部与长沙市县道教研究会。这些都标志着长沙佛教、道教近代化的某些发展。

长沙伊斯兰教在近代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并一度出现兴盛的状况。长沙穆斯林原有本班、客班之分。清道光、咸丰年间，又有一批南京籍穆斯林经商来长，称为金陵班或南京班。1918年，他们在三兴街又建立一座清真寺，一时之间，伊斯兰教活动在长沙颇为活跃。近代后期，长沙伊斯兰教也出现了某些走向近代化的趋势。一是成立了自己的团体。1933年成立回教联合会，次年改名为中华回教公会湖南分会。1935年，长沙各清真寺联合成立了伊斯兰教清真寺董事会。长沙穆斯林开始走向统一。二是对内部宗教仪典和习俗进行了一些改革，阿訇在教内地位提高。三是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学堂。1918年，长沙清真寺曾创办了一所私立敬信小学。1938年的长沙大火，使长沙清真寺及出租房产全部被焚，长沙伊斯兰教因此元气大伤。此后长沙战火频仍，穆斯林疏散外迁。伊斯兰教的发展严重被挫。

^① 《长沙市志》第十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宗教”。

1946年，长沙穆斯林在原清真寺废墟上因陋就简，重建了一所清真寺，以应宗教活动之需，但终不复往年之盛。

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于20世纪初传入长沙后，很快即有大的发展。清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两教所建的教堂和医疗教育设施被愤怒的饥民焚烧和捣毁。随即两教又通过各国领事公使向清政府索取赔款，重建或修复了各处教堂和医院、学校。在此前后，外国传教士仗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纷至沓来，并加强同中国官绅的联系，大肆购地建堂，发展教徒；创办修院，培植传教；开设学校、医院和社会慈善机构，使其传教事业迅速发展。

从天主教来说，从1902年在长沙兴建第一座教堂，以后即逐渐向各地城乡发展，至1949年解放前夕，长沙地区共有长沙市长春巷，浏阳城关、达浒、水口，宁乡城关，望城靖港等教堂和活动点数十处。教会除办有修道院外，还办有长沙丽文中学、护士学校、天主堂医院、育婴堂、安老院等附属事业机构，还拥有大量田产房地产。1924年，罗马教廷鉴于天主教在长沙的发展，改湖南教区为长沙教区。1946年，长沙教区升为湖南总主教区。从此，长沙天主堂成为湖南天主教的指挥中心。

基督教在长沙的发展较天主教更为广泛，更为迅速。从1902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即有英、美、德、挪威、瑞典、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来到长沙，传入或创立基督教派别，主要有伦敦会、内地会、宣道会、遵道会、圣公会、长老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湘中信义会、湘北信义会、中华基督教湖南大会等教会11个；建立教堂或活动点92处，创立教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神学教育机构湖南圣经学院、湖南协和神学院，还办有学校、医院、孤儿院、瞽目院等事业机构。1919年，一些长沙教友则成立了真耶稣教长沙分会。这一时期的长沙基督教会大多为外国差会，其团体、机构亦大多被外国差

会控制，受外国势力支配。

在这一时期，长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一些爱国的中国籍神职人员，也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1904年秋，黄兴领导华兴会起义事败。长沙圣公会会长黄瑞祥（吉亭）将他隐蔽在圣公会楼上一个多月，并帮助他化装脱险去武汉转上海。从七七抗战到解放前后，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总干事张以藩的主持下，曾为宣传抗日救亡、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和迎接解放等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然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长沙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使其不断地受到一些冲击。1922—1925年，我国“非基督教运动”兴起，长沙也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一些基督教徒和大批教会学校学生积极参加运动，主张中国教会脱离帝国主义，一些教会学校学生甚至愤而退出学校。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大革命运动，使教会势力受到更大冲击，教堂被捣毁，传教士纷纷逃离。为了对付革命的高潮，挽救在华教会的危机，天主教和基督教对在华教会实行了一些改革，提出要使在华天主教“中国化”和使在华基督教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籍的神职人员提出了“自养、自治、自传”的口号，曾先后成立了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长沙自立福音会等自立教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切都没有不可能改变外国势力操纵长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状况。

三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自产生以来总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而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则适应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其长期存在

和发展的进程中，也对人们的思想、文化、信仰及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沙五大宗教传入和发展的历史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其禅宗在古代长沙地区传播，其教义中不少内容融入中国儒学，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部分。道教的修炼和养生及治病的方法，其中不乏科学的因素，长期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长沙著名道士孙思邈，又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号称“药王”。在文化方面，佛、道二教亦有重要的影响。自唐以来，佛教徒注重文学艺术的修养，诗僧和僧人书法家辈出。唐代著名诗僧齐己、杰出书法家怀素都曾在长沙活动，并留下佳句名作，光耀史册。清代高僧寄禅、笠云同时也是有名诗人，曾与湖南著名士绅、学者、诗人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等组织碧湖诗社，酬唱应答，成为晚清诗坛雅事。道教素有音乐的传统。长沙道教音乐具有庄严、典雅、优美动听的特点，至今仍为我国音乐界所推重。佛、道二教的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长沙地区保存的麓山寺、密印寺、开福寺、陶公庙等寺庙宫观，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伊斯兰教产生于西亚，其传播来长沙，同时也传播了中亚的文明。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与长沙回、维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有的内容已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习于艰苦、善于经商。清代至民国时，来长沙的穆斯林颇为活跃，在长沙创办了徐长兴清真餐馆、李合盛清真餐馆、马恒记百货商店、沙昌记绸缎批发庄等店号，有的还成为长沙的名老字号，流传至今。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长沙的时间不长，但在长沙创办了一些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较早地传入了近代教育和医药知识，各类教堂及其附属房屋建筑，引进了西方的建筑科学与建筑艺术。

四

解放以后，天主教、基督教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长沙的宗教出现了新的面貌。长沙市佛教界开展学习和生产运动，废除了旧社会寺门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1952年9月19日，长沙市佛教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6年8月15日至16日，长沙市佛教徒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开福寺召开，正式成立了长沙市佛教协会。1958年、1962年分别召开了长沙市佛教协会第二届、第三届代表会议。道教中全国有名的坤道道观——长沙县水塘乡河图观，在住持罗浩明道长的带领下，数十年爱国守法，边劳动，边修炼，扶老济困，成为全国道教爱国爱教的典型。解放后，伊斯兰教改选了清真寺管理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952年和1957年对清真寺进行了较大的维修。长沙的天主教爱国教徒余运昌、倪明亮等最先于1950年12月响应四川广元王良佐神甫的号召，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得到了广大爱国教徒和神职人员的响应，于次年4月成立了长沙教区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1951年，全市神长教友参加了控诉美国侵略朝鲜罪行的大会，拥护政府驱逐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1952年6月1日，召开了长沙市天主教第一届教友代表会议，正式成立长沙市天主教爱国会。1956年5月举行了长沙市天主教第二届教友代表会议，1958年10月，自选自圣熊德涟神甫为长沙教区正权主教，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长沙市爱国的基督教人士和信徒解放后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1954年10月正式成立了长沙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58年4月25日，召开了长沙市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同年，根据“合而为一”和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全市的基督教徒不分原来的教派，分别就近进城北的永恒堂、城中的三自堂、城南的福音堂作礼拜或守安息，一扫过去教派林立、互相排挤的旧习。

1958年，长沙市各宗教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开展了生产活动。天主教、基督教组建了联合生产委员会，并创办了东风砂轮砂布厂和东风畜牧场两个生产基地，组织有劳动能力的教牧神职人员参加生产劳动；佛、道教徒在解放初期就先后参加工业和农业生产劳动，为宗教团体自养打下了基础。

1958年后，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反右派扩大化波及宗教界人士。“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全盘否定，宗教界人士受到冲击和迫害，宗教设施、经籍和历史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寺观教堂被占用，有的还被拆毁，全市各宗教均被迫停止活动。

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到落实，80年代初长沙市各宗教陆续恢复活动，因“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在宗教界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和平反。

1980年，长沙市原有的佛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均先后恢复了活动，开展了正常的工作。随后，开福寺、清真寺、天主堂、基督教城北堂（永恒堂）以及麓山寺、云麓宫和基督教城南堂等先后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宗教界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以及“文革”中被挤占的住房问题陆续解决。全市各宗教团体应落实政策的104处房产

(82516平方米)，到1986年已落实100处(79730平方米)，市房地部门在“文革”中积欠各宗教团体的房租56万元也已全部归还。

1985年，长沙市五大宗教先后召开了“文革”后的首次代表会议，恢复或新成立的七个市级宗教团体均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其中市佛教协会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开福寺方丈明真法师担任会长。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一是全市的主要寺观教堂已经基本由各宗教收回并开放，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87年，市伊斯兰教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共筹资180多万元，在天心区白沙岭建设新清真寺。这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及其附属房屋，建筑面积共2000平方米，十分庄严肃穆。现在，全市批准开放的106处宗教活动场所均进行了登记和履行年检，保障了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二是对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寺观教堂进行维修或重建，特别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麓山寺、开福寺、密印寺、石霜寺、陶公庙等均维修一新。三是加强了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市、县18个爱国宗教团体较好地发挥了作用。1987年，天主教祝圣屈天锡为长沙教区主教，还先后祝圣了5位神甫；基督教先后按立了5位牧师。1994年8月，麓山寺举行隆重的方丈升座仪式，迎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圣辉法师为麓山寺方丈。1999年5月，圣辉法师为首在麓山寺、开福寺创办了湖南佛学院，以着力培养佛教人才。四是继续解决落实宗教房地产政策遗留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至20世纪末，归还麓山寺后山门、云麓宫吕祖殿、天主教修女院等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五是帮助有关宗教团体创办一些为社会服务的企事业，如市基督教开办了老年人之家和育苗幼儿园。六是帮助各教开展宗教方面的外事